·本土化与中国学术转型·

文之将史,其流一焉

——《文心雕龙》何以影响《史通》

戚良德,秦元元

(山东大学 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,济南 250100)

[摘 要]《文心雕龙》是文论,《史通》是史学,何以一部文论作品会对一部史学著作产生深刻影响?其具体影响又是什么呢?刘知幾在认真分析《文心雕龙》何以产生的基础上,第一次大量引用《文心雕龙》、并明确标注刘勰之名及其著作。实际上,并非《文心雕龙·史传》篇,而是刘勰对"文"的基本观念,使得刘知幾找到了史学的安身立命之所,找到了可以一显身手的天地。《文心雕龙》所谓"文之为德也大矣"的理念,被刘知幾贯彻到史学观念之中,其"远矣大矣"的"文"正相当于"史";刘勰对晋宋以来"文体解散"的批判则成了刘知幾的理论武器,被他巧妙地运用到了史学理论的建树上,形成"文之将史,其流一焉"的观念。刘知幾是一个相当高明的学生,他大量采择刘勰的文词,运用刘勰的思想理论,却完成了一部具有独特价值的史学著作。《文心雕龙》的文章观念笼罩《史通》,却并未将其淹没,而是最终成就了文史双美的佳话,这正是中国文论的独特魅力之所在。

[关键词]刘知幾;《史通》;刘勰;《文心雕龙》;影响

[中图分类号]I209 [文献标识码]A [文章编号]1671-3842(2022)01-0040-09

有唐一代,《文心雕龙》之名并不彰显,但其影响却是多方面的,只是"有的明引,有的暗用"而已,"唐代注疏家如孔颖达、李善、吕向、张铣、李周翰等,撰《五经正义》……他们著书立说,无不采取刘勰《文心雕龙》作依据,而干没其名。"[①]《文心雕龙》在唐代的巨大影响,典型地体现在著名史学家刘知幾及其《史通》一书。正如蒋祖怡先生所说:"在唐代,受《文心雕龙》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刘知幾的《史通》了。"[②]应该说,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。《文心雕龙》是文论,《史通》是史学,在刘知幾那里,文史已经分得很清楚,何以一部文论作品会对一部史学著作产生深刻影响?即使《文心雕龙》有《史传》篇,但那也是"论文"中的一篇,又如何成为《史通》之本?宋代黄庭坚早就指出《文心雕龙》与《史通》有着密切关系,他说:"刘勰《文心雕龙》,刘子玄《史通》,此两书曾读否?所论虽未极高,然讥弹古人,大中文病,不可不知也。"[③]明人王惟俭对此深信不疑,而谓:"余既注《文心雕龙》毕,因念黄太史有云,论文则《文心雕龙》,评史则《史通》,二书不可不观,实有益于后学,复欲取《史通》注之。"[④]但如果说《文心雕龙》"大中文病",自然没有问题,《史通》之作,何以亦"大中文病"?这

[基金项目]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"《文心雕龙》汇释及百年'龙学'学案"(项目编号:17ZDA253)之阶段性研究成果。

[作者简介]戚良德,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,博士生导师;秦元元,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生。

①王更生:《隋唐时期的"龙学"》,《文心雕龙研究》第一辑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5年版,第25、19页。

②蒋祖怡:《〈文心〉与〈史通〉》,《文心雕龙学刊》第三辑,济南:齐鲁书社,1986年版,第43页。

③黄庭坚:《与王立之》,刘琳等校点:《黄庭坚全集》,成都:四川大学出版社,2001年版,第1370页。

④王惟俭:《〈史通训故〉序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史部第279册,济南:齐鲁书社,1996年版,第300页。

除了说明黄庭坚心目中的“文”较为宽泛之外，更说明《文心雕龙》所论之“文”，决非后世纯艺术性的“文学”之文，从而《文心雕龙》也就决非一般的谈文论艺之作所可比拟，而是一部有着广泛覆盖面的文化经典。王更生先生指出：“从学术领域上看：它影响范围广阔，无论是经部、史部、子部、集部，尤其集部，更旁涉总集和别集，可以说凡是文学理论的问题，不管是明滋或暗长，总与《文心雕龙》有关系。”[①]其实，既然影响及于四部，也就决非仅仅关乎“文学理论”了，这正是两部书可以密切相关的奥秘之所在。

一、润物无声：《文心雕龙》对《史通》的沾溉

《文心雕龙》对《史通》的具体影响是什么呢？明代胡应麟说：“《史通》之为书，其文刘勰也，而藻绘弗如。”[②]清人孙梅亦谓：“《史通》一书，心摹手追者，《文心雕龙》也。观其纵横辨博，固足并雄；而丽藻遒文，犹或未逮。”[③]他们都认为《史通》在行文写作上取法《文心雕龙》，但文采尚有不足。这似乎意味着，刘知幾所向往的只是刘勰的文章笔法而已。然而，傅振伦先生认为：“《文心》论文笔法，亦即所以言史法也。知幾之书多出于刘勰，故其书亦全模拟之，立意亦多取之也。两氏史学思想，亦多相同。”[④]他指出：“《文心雕龙》为文史类之书，然《史传》一篇，则论史之功用、源流利病、史籍得失及撰史态度，实为史评之先河。《史通》一书，即就《文心·史传篇》意推广而成。其全书亦即就彦和《史传篇》‘寻繁领杂之术，务信弃奇之要，明白头讫之术，品酌事例之条’诸义，而详加发挥者。……一论文学，一论史学，并具卓识。”[⑤]正因如此，傅先生认为：“《史通》各篇，亦多仿《文心》。”[⑥]他甚至具体列出了两部书篇目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：

> 《文心》《原道》《征圣》诸篇概论文学并及其起源，而《史通》有《六家》之篇。《文心》《宗经》至《书记》诸篇述文章派别，而《史通》有《二体》《杂述》诸篇。《文心》《神思》以下诸篇详治文之方法——文学艺术，而《史通》有《载言》以次三十一篇。《文心》有《体性篇》，而《史通》有《叙事篇》；《文心》有《镕裁篇》，而《史通》有《烦省篇》；《文心》有《时序》《才略》等篇，而《史通》有《言语》《核才》等篇；《文心》有《知音篇》，而《史通》有《鉴识》《探赜》《忤时》诸篇；《文心》有《程器》篇，而《史通》有《直书篇》；《文心》有《序志篇》，而《史通》有《自叙篇》。[⑦]

不仅如此，傅先生还从十七个方面详细列举了《史通》与《文心雕龙》众多说法的相同或一致之处，最后又列举刘知幾甚至沿袭了刘勰的一些错误说法，因而指出：“盖知幾深信勰说，故取之而不疑。知幾熟读勰书，故行文构句，亦因习之而不改。知幾之学多导源于勰，信不诬也。”[⑧]如此说来，两书深厚的渊源关系乃是并不多见的。

事实也是，在《文心雕龙》撰成两百年后，第一个认真分析这部文论著作之所以问世的，正是刘知幾。他在《史通》的《自叙》篇中列举了《淮南子》《法言》《论衡》《风俗通》《人物志》《典语》等诸书的著作缘起，在谈到《文心雕龙》产生的必然性时，他说：“词人属文，其体非一，譬甘辛殊味，丹素异彩；后来祖述，识昧圆通，家有诋诃，人相掎摭，故刘勰《文心》生焉。”[⑨]这里，刘知幾没有很直接地评价《文心雕龙》，但实际上却评价不低。他从文章写作艺术风格的多样性谈到人们对文章认识的偏

---

①王更生：《隋唐时期的“龙学”》，《文心雕龙研究》第一辑，第25页。

②胡应麟：《少室山房笔丛》卷十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8年版，第176页。

③孙梅著、李金松校点：《四六丛话》卷三十二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10年版，第644页。

④⑤⑥⑧傅振伦编：《刘知幾年谱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3年版，第22页，第21页，第21页，第27页。

⑦傅振伦编：《刘知幾年谱》，第21—22页。按：张舜徽先生亦有大致相同的说法，当为沿袭傅先生之说。参见张舜徽：《史学三书平议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3年版，第98—99页。

⑨刘知幾：《史通·自叙》，浦起龙释：《史通通释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8年版，第291页。

颇,说明正确而公正的文章和文学理论批评是并不容易产生的,从而说明《文心雕龙》产生的历史必然性,这就给了这部书非同一般的重要历史地位。同时,刘知幾在指出一般的文章批评"识昧圆通"的时候,也就肯定了《文心雕龙》之"圆通"的理论特色。所谓"圆通",乃是议论通达而不失之过激,观点全面而不失之偏颇;可以说近于刘勰所说的"折衷"之境。《文心雕龙》超出齐梁时代古今文体之争的一个重要特点,正是理论认识上的"圆通"。按照刘知幾的意思,那就是刘勰能够理解文章的"其体非一",也就是艺术风格的多种多样,能够体验到文章写作的"甘辛殊味",从而做到理论和批评的公正。应该说,刘知幾主要的着眼点在于《文心雕龙》产生的现实针对性,也就是"家有诋诃,人相掎摭"的文章批评的混乱情形;所谓"圆通",首先便是较之一般人认识上的更为通达,其与沈约"深得文理"[①]的评价相比较,是可以互相补充的。

不过,刘知幾对《文心雕龙》的认识不仅更为具体,而且其将《文心雕龙》纳入一系列重要思想论著的产生链条之中,对其产生原因予以认真分析,这种理论上的自觉重视显然是空前的。当然,他的《史通》也正是在这一链条上的重要著作。其云:

> 若《史通》之为书也,盖伤当时载笔之士,其义不纯,思欲辨其指归,殚其体统。夫其书虽以史为主,而余波所及,上穷王道,下挟人伦,总括万殊,包吞千有。自《法言》已降,迄于《文心》而往,固以纳诸胸中,曾不憀芥者矣。夫其为义也,有与夺焉,有褒贬焉,有鉴诫焉,有讽刺焉。其为贯穿者深矣,其为网罗者密矣,其所商略者远矣,其所发明者多矣。[②]

张舜徽先生就此指出:"上文分举《淮南子》《法言》《论衡》《风俗通》《人物志》《典语》《文心雕龙》诸书既竟,此处又总言固已纳诸胸中,曾无憀芥,以明《史通》之作,乃继诸家而起。综观《史通》全书,大抵勇于纠谬,能言人之所不敢言,与《论衡》为近。而论列史法,扬搉体例,则胎袭于《文心雕龙》者尤多。"[③]

实际上,刘知幾并不讳言自己对《文心雕龙》的倚重,他也是史上第一个大量引用《文心雕龙》,而且数次明确标注刘勰之名及其著作的人。如"昔刘勰有云:'自卿、渊已前,多役才而不课学;向、雄已后,颇引书以助文。'然近史所载,亦多如是。故虽有王平所识,仅通十字;霍光无学,不知一经。而述其言语,必称典诰。良由才乏天然,故事资虚饰者矣。"[④]此处引《才略》之说为据,批评"事资虚饰"之风。又如:"然其撰《甘泉赋》,则云'鞭宓妃'云云,刘勰《文心》已讥之矣。然则文章小道,无足致嗤。观其《蜀王本纪》,称杜魄化而为鹃,荆尸变而为鳖,其言如是,何其鄙哉!所谓非言之难而行之难也。"[⑤]此处引《夸饰》之语,说明虽"文章小道",用词不慎尚且被讥笑,何况历史著作?不管刘知幾是否赞成刘勰之论,如此明确地引用,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,至少切实说明了《文心雕龙》在唐代的重要影响。

由于《文心雕龙》有《史传》篇,故多以为刘知幾作《史通》必先取法《史传》,这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蒋祖怡先生便谓:"《史通》中论'史'的观点,基本上本于《文心雕龙·史传篇》。"[⑥]王更生先生也认为:"《文心雕龙·史传》篇,从字数多寡上看,虽仅及《史通》六十分之一,但由内容方面探讨,《史传》篇由史例、史评的阐发,旁推交通,论到著述的目的,和史家著述的观点,无一不和刘知幾《史通》息息相关。"[⑦]刘知幾当然不会忽视《史传》篇,但总体来看,对近十万字的《史通》而言,一千

①姚思廉:《梁书》卷五十《文学下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20年修订版,第791页。

②刘知幾:《史通·自叙》,浦起龙释:《史通通释》,第291—292页。

③张舜徽:《史学三书平议》,第98页。

④⑤刘知幾:《史通·杂说下》,浦起龙释:《史通通释》,第510页,第519—520页。

⑥蒋祖怡:《〈文心〉与〈史通〉》,《文心雕龙学刊》第三辑,第45页。

⑦王更生:《隋唐时期的"龙学"》,《文心雕龙研究》第一辑,第18页。

多字的《史传》篇并未成为其根本纲领。当然，更重要的还不是字数问题，从根本上说，作为一部文论著作之一篇的《史传》，并不符合刘知幾作《史通》的总体要求，也就难以承担纲领之任。实际上，刘知幾取法于《史传》篇的内容，决不比其他篇章更为突出。或者说，《史通》真正得之于《文心雕龙》的精髓，并不在《史传》篇。那么，《文心雕龙》之于《史通》的最大影响在哪里呢？笔者认为，主要是隐显两个方面。从隐而不彰的方面说，刘知幾熟读《文心雕龙》，从刘勰的思维方式到文章写作中的遣词造句，刘知幾对其熟悉程度和得心应手，可以说已经臻于化境。上述胡应麟、孙梅之语，皆有一半说得非常正确，那就是所谓“《史通》之为书，其文刘勰也”[①]，所谓“《史通》一书，心摹手追者，《文心雕龙》也”，所谓“纵横辨博，固足并雄”[②]也，刘知幾得刘勰为文真传，那是肯定没有问题的。但所谓“藻绘弗如”[③]，所谓“丽藻遒文，犹或未逮”[④]，则并非知言了，刘知幾有意为史，在他的心目中，文史的标准判然有别。其云：

> 自战国已下，词人属文，皆伪立客主，假相酬答。至于屈原《离骚》辞，称遇渔父于江渚；宋玉《高唐赋》，云梦神女于阳台。夫言并文章，句结音韵。以兹叙事，足验凭虚。而司马迁、习凿齿之徒，皆采为逸事，编诸史籍，疑误后学，不其甚邪！[⑤]

所谓“言并文章，句结音韵”，即是说其用语讲究文采和声韵，这对于“叙事”之作而言，是靠不住的。胡应麟所谓“藻绘”者，孙梅所谓“丽藻”者，皆等于刘知幾这里的“文章”，原非史之本分，以文例史，乃不得要领也。

作为文章之师，刘勰对刘知幾的影响可谓“润物细无声”，十分细微而并不彰显，却又无处不在，这就是上述傅振伦先生细辨《史通》与《文心雕龙》的根据所在；实际上，我们很难说《史通》的那些章节一定取法于《文心雕龙》，但又确乎有些影子。即使一些看上去较为明显的引用，如“轮扁所不能语斤，伊挚所不能言鼎”，确乎来自《文心雕龙·神思》，但实际上，刘知幾用来说明“华逝而实存，滓去而渟在”的“叙事”之理，所谓“能损之又损，而玄之又玄”[⑥]，这与刘勰在《神思》的运用已风马牛不相及了。再如刘知幾对“知音”或“知音君子”等词的大量运用，诸如“庶知音君子，详其得失者焉”[⑦]、“夫识宝者稀，知音盖寡”[⑧]、“适使时无识宝，世缺知音”[⑨]、“犹冀知音君子，时有观焉”[⑩]，等等，其显然取法刘勰，却与刘勰《知音》之意并不等同。至于杂糅《文心雕龙》之句式或文意而用于表达自己的想法，这样的情况就更多了，如：“斯则物有恒准，而鉴无定识，欲求铨核得中，其唯千载一遇乎！”[⑪]短短的几句话中，化用了《物色》“物有恒姿，而思无定检”、《序志》“唯务折衷”、《知音》“逢其知音，千载其一乎”等句，甚至其“铨核”之语，也化用自刘勰喜欢用的“铨评”“铨配”“铨列”“铨贯”“铨别”等语。由此不难看出，《文心雕龙》对《史通》这种细微而巨大的影响，犹如盐溶于水，虽不能说无迹可求，但一一寻踪，却是并不容易的。

二、文史不二：《史通》取法《文心雕龙》之根本

《文心雕龙》对《史通》最大最明显的影响，并非《史传》篇，而是刘勰对文的基本观念。可以说，正是刘勰的文章观，使得刘知幾找到了史学的安身立命之所，找到了自己可以一显身手的天地。

---

①③胡应麟：《少室山房笔丛》卷十三，第176页，第176页。

②④孙梅著、李金松校点：《四六丛话》卷三十二，第644页，第644页。

⑤刘知幾：《史通·杂说下》，浦起龙释：《史通通释》，第521页。

⑥⑧刘知幾：《史通·叙事》，浦起龙释：《史通通释》，第171，第167页。

⑦刘知幾：《史通·邑里》，浦起龙释：《史通通释》，第145页。

⑨⑪刘知幾：《史通·鉴识》，浦起龙释：《史通通释》，第206页，第204页。

⑩刘知幾：《史通·自叙》，浦起龙释：《史通通释》，第292页。

《史通·载文》有云：

> 夫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；观乎国风，以察兴亡。是知文之为用，远矣大矣。若乃宣、僖善政，其美载于周诗；怀、襄不道，其恶存乎楚赋。读者不以吉甫、奚斯为谄，屈平、宋玉为谤者，何也？盖不虚美，不隐恶故也。是则文之将史，其流一焉，固可以方驾南、董，俱称良直者矣。①

《文心雕龙·史传》有“辞宗丘明，直归南、董”②之语，是要求史书写作要像春秋时期的南史氏和董狐那样秉笔直书，而刘知幾则说文史本为一脉，正因其“不虚美、不隐恶”的实录，才可以与南史、董狐并驾齐驱，才可以称得上是“良文直笔”。看起来其化用了刘勰的文句，实则悄悄进行了转换，那就是无论文史，均需实录，善政要载其美，不道应存其恶，这样才能“以察兴亡”，也才能“以化成天下”。实际上，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，才有所谓“文之将史，其流一焉”。从而，所谓“文之为用，远矣大矣”，这里的“文”乃是与“史”不二的，均为“不虚美、不隐恶”之作。也正是在这里，刘知幾找到了刘勰这位知音。《文心雕龙》开篇即云：“文之为德也，大矣！”又说：“木铎启而千里应，席珍流而万世响；写天地之辉光，晓生民之耳目矣！”③而刘勰这个“文”，正是“肇自太极”的“人文”，所谓“观天文以极变，察人文以成化；然后能经纬区宇，弥纶彝宪，发挥事业，彪炳辞义”④，这个“文”里面，正有着“史传”，则所谓“远矣大矣”的“文之为用”，不也正是“史”之为用吗？所以，说起来，刘知幾对刘勰所谓“直归南、董”的悄悄转化，并不违背《文心雕龙》的基本原则。这便是一个论文、一个论史，看起来原本属于两个领域的两部书，却有着密不可分关系的秘密所在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说刘勰对刘知幾影响最大的是其文章观念。如果没有这样宽泛的文章观念和文体意识，比如像钟嵘《诗品》那样只是论诗(五言诗)，那么无论所论如何精彩，都不会成为刘知幾取法的对象。

其实，不用说诗了，即便是文，对刘知幾而言，假如不符合实录的标准，也仍然是无用的。《载文》说：“爰洎中叶，文体大变，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，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。譬如女工之有绮縠，音乐之有郑、卫。……若马卿之《子虚》《上林》，扬雄之《甘泉》《羽猎》，班固《两都》，马融《广成》，喻过其体，词没其义，繁华而失实，流宕而忘返，无裨劝奖，有长奸诈，而前后《史》《汉》皆书诸列传，不其谬乎！”⑤饶有趣味的是，刘知幾这里的一些用词，皆取自刘勰，如对“诡妄”“淫丽”的批判，“绮縠”“郑卫”比喻之运用，“繁华失实”“流宕忘返”之语，可以说这些用语本身均秉持刘勰之意，但它们整体要说明的问题则判然有别了。刘知幾要求的是“至如史氏所书，固当以正为主”，是“其理谠而切，其文简而要，足以惩恶劝善，观风察俗者矣”⑥，总之是史之“良直”，并从而发挥劝善惩恶、移风易俗之效用。说起来，刘知幾所要求的这些效用，与刘勰的想法亦并不矛盾，甚至所谓“谠而切”“简而要”，也都是刘勰的文意；然而，对文论家的刘勰来说，并没有这么单纯，《文心雕龙》所论，原本有着多重指向和丰富的文意，因而具有相当的复杂性。但刘知幾似乎顾不上这么多，他只想取其所需，而在刘勰建构的理论大厦里，真可谓应有尽有，完全可以“任力耕耨，纵意渔猎”⑦，这便是《文心雕龙》的伟大，当然它又正好遇上了心有灵犀的刘知幾。

那么，刘知幾所要的文章是什么样的呢？其云：

> 盖山有木，工则度之。况举世文章，岂无其选，但苦作者书之不读耳。至如诗有韦孟《讽谏》，赋有赵壹《嫉邪》，篇则贾谊《过秦》，论则班彪《王命》，张华述箴于女史，张载题铭于剑阁，

①刘知幾：《史通·载文》，浦起龙释：《史通通释》，第123页。

②刘勰：《文心雕龙·史传》，戚良德辑校：《文心雕龙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5年版，第101页。

③④刘勰：《文心雕龙·原道》，戚良德辑校：《文心雕龙》，第3页，第4页。

⑤⑥刘知幾：《史通·载文》，浦起龙释：《史通通释》，第123—124页，第124页。

⑦刘勰：《文心雕龙·事类》，戚良德辑校：《文心雕龙》，第222页。

诸葛表主以出师，王昶书字以诫子，刘向、谷永之上疏，晁错、李固之对策，荀伯子之弹文，山巨源之启事，此皆言成轨则，为世龟镜。求诸历代，往往而有。苟书之竹帛，持以不刊，则其文可与三代同风，其事可与《五经》齐列。古犹今也，何远近之有哉？①

可见，从文体而言，刘知幾并无特别要求，举凡诗赋论铭、箴表疏策，皆有可取，要在“言成轨则，为世龟镜”，也就是于世有用，不尚虚谈，所谓“拨浮华，采贞实”②，只有这样的文章方可“与三代同风”“与《五经》齐列”。当然，刘知幾所说乃所谓“为史而载文”，即选择可以载入史书之“文”，但也正因如此，这个“文”反而格外重要，选择的标准自然也较为严格，于此也就可以看到其重要的文章观念。这个观念既在《文心雕龙》的笼罩之下，又与刘勰的“论文”宗旨并不完全相同。

《文心雕龙》之文章观念对《史通》的笼罩首先表现在两个方面，一是刘勰“文之为德也大矣”的理念，已被刘知幾贯彻到自己的史学观念之中，其所谓“远矣大矣”的“文”正相当于“史”。二是刘勰对晋宋以来“文体解散”③的批判，成为刘知幾的理论武器，被他巧妙地运用到了史学理论的建树上，那就是其文史之辨。如上所述，在均为“实录”的意义上，“文之将史，其流一焉”，然而，另一个明显的事实，刘知幾无法视而不见，那就是大量的“文”并非“实录”，从而文史也就未必“流一”。对此，他是有着明确意识的，其云：“昔尼父有言：‘文胜质则史。’盖史者，当时之文也，然朴散淳销，时移世异，文之与史，较然异辙。故以张衡之文，而不闲于史；以陈寿之史，而不习于文。其有赋述《两都》，诗裁《八咏》，而能编次汉册，勒成宋典。若斯人者，其流几何？”④即是说，文史之所以“较然异辙”，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，原因在于“朴散淳销”，这也可以说是一种“文体解散”，而且也颇类刘勰所谓“辞人爱奇，言贵浮诡；饰羽尚画，文绣鞶帨”，乃至“离本弥甚，将遂讹滥”⑤，这种过分雕琢修饰之风的盛行，也就意味着质朴淳厚之风的消散。只不过，刘勰说的是整个文风的变化，刘知幾说的却是文史之“异辙”。刘知幾进一步指出：

昔夫子有云：“文胜质则史。”故知史之为务，必藉于文。自《五经》已降，《三史》而往，以文叙事，可得言焉。而今之所作，有异于是。其立言也，或虚加练饰，轻事雕彩；或体兼赋颂，词类俳优。文非文，史非史，譬夫乌孙造室，杂以汉仪，而刻鹄不成，反类于鹜者也。⑥

以前的“史”也就是“文”，固然在于其有着淳朴的共同特征，但所谓“文胜质则史”，说明史书要达成自己的目标，仍然离不开文的修饰，所谓“以文叙事”；文史之“异辙”在于，或者过分的修饰，所谓“虚加练饰，轻事雕彩”，或者体裁之不清，所谓“体兼赋颂，词类俳优”，以至于形成“文非文，史非史”的状态。这就愈发类似刘勰所谓“文体解散”之弊了，但刘知幾的着眼点仍然在于文史之“异辙”。有趣的是，刘知幾这里用的“刻鹄类鹜”，刘勰也用过，但那是用以论“比”，刘知幾则用以谈“文非文，史非史”的情形，可以说完全不同，但又确实来自《文心雕龙》。这便是典型的彼刘对此刘的影响，刘知幾精熟文心之理且运用之妙，可谓不留痕迹。但总起来看，他接受了刘勰的文章观念，只不过用以谈史学，其之所以可能，原因就在于，在刘勰的观念体系中，文与史确乎是并不矛盾的，《文心雕龙》中原本就有《史传》篇。

三、殊途同归：文史双美的《文心雕龙》与《史通》

于是，不仅刘勰对南朝文风的批判成了刘知幾的理论武器，而且《文心雕龙》大量的文章写作

①②刘知幾：《史通·载文》，浦起龙释：《史通通释》，第127页。

③⑤刘勰：《文心雕龙·序志》，戚良德辑校：《文心雕龙》，第286页。

④刘知幾：《史通·核才》，浦起龙释：《史通通释》，第250页。

⑥刘知幾：《史通·叙事》，浦起龙释：《史通通释》，第180页。

之理,自然也成了《史通》的著述之道,只不过仍然经过了刘知幾的悄悄转换。如谓:“夫史之叙事也,当辩而不华,质而不俚;其文直,其事核,若斯而已可矣。必令同文举之含异,等公干之有逸,如子云之含章,类长卿之飞藻;此乃绮扬绣合,雕章缛彩,欲称实录,其可得乎?”[①]显然,刘知幾明确要求不能“雕章缛彩”,只能以“实录”为目标,这和《文心雕龙》所谓“古来文章,以雕缛成体”[②]的说法截然不同。然而,所谓“辩而不华,质而不俚”,这与《文心雕龙》对文章的基本要求则是并不矛盾的;所谓“其文直”,与刘勰所谓“直而不野”[③]“义直而文婉”[④]的要求也是一致的,《史传》原本就赞成“良史之直笔”[⑤];所谓“其事核”,则正是来自刘勰的说法,如“体周而事核”[⑥]“事核而言练”[⑦]“事核理举”[⑧]等。再如:“夫史之称美者,以叙事为先。至若书功过,记善恶,文而不丽,质而非野,使人味其滋旨,怀其德音,三复忘疲,百遍无斁,自非作者曰圣,其孰能与于此乎?”[⑨]这里的“质而非野”显然即是《明诗》的“直而不野”,所谓“味其滋旨”,亦可视为刘勰“余味日新”[⑩]“余味曲包”[⑪]“滋味流于字句”[⑫]“味之则甘腴”[⑬]等说法的化用;至于所谓“怀其德音”,其中的“德音”即来自《文心雕龙》,如“有亏德音”“德音大坏”[⑭]“崇让之德音”[⑮]等。又如:“昔圣人之述作也,上自《尧典》,下终获麟,是为属词比事之言,疏通知远之旨。……然则意复深奥,诰训成义,微显阐幽,婉而成章,虽殊途异辙,亦各有美焉。谅以师范亿载,规模万古,为述者之冠冕,实后来之龟镜。”[⑯]从用词到文意,可以说皆取自刘勰,如“微显阐幽”之语,便化用“神道阐幽,天命微显”[⑰]之说,“婉而成章”之语则来自《比兴》篇。

当然,更重要的不仅是这些文词、文意的袭用,而是关于文章基本美学观的一致。刘勰曾不止一次地引用《尚书》所谓“辞尚体要,不唯好异”[⑱]之论,将“辞尚体要”转换为对文章的基本要求,这个“体要”乃是切实而简要之意,既要“简要”,又必须“辞约而旨丰,事近而喻远”[⑲],以最少的语言表达最丰富的意蕴。刘知幾便完全继承了这一文章美学观。他说:“夫国史之美者,以叙事为工,而叙事之工者,以简要为主。简之时义大矣哉!”又说:“然则文约而事丰,此述作之尤美者也。”[⑳]其承袭刘勰之意,乃是显然可见的。其《叙事》篇又曰:“夫饰言者为文,编文者为句,句积而章立,章积而篇成。篇目既分,而一家之言备矣。古者行人出境,以词令为宗;大夫应对,以言文为主。况乎列以章句,刊之竹帛,安可不励精雕饰,传诸讽诵者哉?”[㉑]不仅这里对章句的论述以《文心雕龙》为根据,而且所谓“励精雕饰”,其与刘勰“雕琢其章”[㉒]之论已经完全一致了,这说明从根本上说,刘知

①刘知幾:《史通·鉴识》,浦起龙释:《史通通释》,第205页。
②刘勰:《文心雕龙·序志》,戚良德辑校:《文心雕龙》,第286页。
③刘勰: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,戚良德辑校:《文心雕龙》,第31页。
④⑥刘勰:《文心雕龙·哀吊》,戚良德辑校:《文心雕龙》,第81页,第82页。。
⑤刘勰:《文心雕龙·史传》,戚良德辑校:《文心雕龙》,第101页。
⑦刘勰:《文心雕龙·诸子》,戚良德辑校:《文心雕龙》,第109页。
⑧刘勰:《文心雕龙·封禅》,戚良德辑校:《文心雕龙》,第138页。
⑨⑯⑳㉑刘知幾:《史通·叙事》,浦起龙释:《史通通释》,第165页,第165页,第168页,第173页。
⑩刘勰:《文心雕龙·宗经》,戚良德辑校:《文心雕龙》,第13页。
⑪刘勰:《文心雕龙·隐秀》,戚良德辑校:《文心雕龙》,第232页。
⑫刘勰:《文心雕龙·声律》,戚良德辑校:《文心雕龙》,第200页。
⑬刘勰:《文心雕龙·总术》,戚良德辑校:《文心雕龙》,第247页。
⑭刘勰:《文心雕龙·谐讔》,戚良德辑校:《文心雕龙》,第93、94页。
⑮刘勰:《文心雕龙·书记》,戚良德辑校:《文心雕龙》,第160页。
⑰刘勰:《文心雕龙·正纬》,戚良德辑校:《文心雕龙》,第19页。
⑱孔安国传,孔颖达疏:《尚书正义》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0年版,第817页。
⑲刘勰:《文心雕龙·宗经》,戚良德辑校:《文心雕龙》,第13页。
㉒刘勰:《文心雕龙·情采》,戚良德辑校:《文心雕龙》,第194页。

幾对文章的用心修饰是并不反对的，不仅不反对，而且其所谓“简约”，乃是经过精心修饰之后的一种境界。其云：“然章句之言，有显有晦。显也者，繁词缛说，理尽于篇中；晦也者，省字约文，事溢于句外。然则晦之将显，优劣不同，较可知矣。夫能略小存大，举重明轻，一言而巨细咸该，片语而洪纤靡漏，此皆用晦之道也。”[①]这里看起来更为推崇“省字约文，事溢于句外”的所谓“用晦之道”，但所谓“一言而巨细咸该，片语而洪纤靡漏”，这样的语言运用之境，没有精雕细刻的功夫，显然是难以达到的。

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刘知幾这种对“用晦之道”的推崇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对史书的特别要求，或者说其着眼点已然不是专就史书而言了。纪昀曾指出：“显晦云云，即彦和隐秀之旨。”[②]一般的文章写作之道固然可以适用于史书，但即使在《文心雕龙》中，刘勰对“史传”的要求也毕竟有所不同，所谓“文非泛论，按实而书”，所谓“若任情失正，文其殆哉”[③]，等等，对史书而言，“实录”应该是第一位的要求，而“隐秀”应该是比较远的要求了，或者说，它肯定不是史书的当务之急。然而，刘知幾却非常重视这个问题，或者说，很看重“隐秀”的文章境界。《叙事》有云：

> 昔古文义，务却浮词。……文如阔略，而语实周赡。故览之者初疑其易，而为之者方觉其难，固非雕虫小技所能斥非其说也。……斯皆言近而旨远，辞浅而义深；虽发语已殚，而含意未尽。使夫读者，望表而知里，扪毛而辨骨，睹一事于句中，反三隅于字外。晦之时义，不亦大哉！[④]

我们不能不说，刘知幾显然深谙艺术的辩证法，所谓“文如阔略，而语实周赡”，初看之下以为不难，真正做起来并不容易，这样的文章之境乃“言近而旨远，辞浅而义深”，具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，从而能够反映事物的本质，使读者“睹一事于句中，反三隅于字外”，也就是达到了一唱三叹之境，令人流连忘返而陶醉其中。然而，这难道是史书的追求吗？或者说，一般的史书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吗？可以说，正是在这里，《史通》与《文心雕龙》殊途同归了，都进入了极高的文章境界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黄庭坚谓二书“大中文病”，要求后辈要读一读这两部书，乃是颇有道理的。

可以看出，作为体大思精的论文之作，《文心雕龙》所谈大量为文之“术”，当然也会为刘知幾所采择，为他的史论服务。即是说，《文心雕龙》的文章写作之道，自然对《史通》产生了重要影响。不过这种影响，一方面是巨大的，另一方面又仍然带有刘知幾的采择特点。那就是，他大量运用刘勰的思想理论，采择刘勰的用词和文意，但整体上仍然是为了他的史学著作服务；看起来有着《文心雕龙》的外衣，实际上也确实不违背刘勰的意愿，却又与刘勰的整体思路相距甚远。《文心雕龙》对《史通》的影响就是如此微妙，换言之，刘知幾是一个相当高明的学生，他深深懂得老师的价值，但弱水三千，只取一瓢饮，他要让《文心雕龙》为他的《史通》服务。也正因如此，我们才在中华文化史上看到了一部了不起的史学著作，它受到《文心雕龙》一书的影响，却并不是《文心雕龙》的翻版，而是有着自己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。

正因如此，黄叔琳评价《史通》一书说：“观其议论，如老吏断狱，难更平反；如夷人嗅金，暗识高下；如神医眼，照垣一方，洞见五藏症结。间有过执己见，以裁量往古，泥定体而少变通，如谓《尚书》为例不纯，史论淡薄无味之类，然其荟萃搜择，钩鈲排击，上下数千年，贯穿数万卷，心细而眼明，舌长而笔辣，虽马、班亦有不能自解免者，何况其余书。在文史类中，允与刘彦和之《雕龙》相匹。徐坚谓史氏宜置座右，信也。”[⑤]纪昀甚至认为：“彦和妙解文理，而史事非其当行。此篇文句特

---

①④刘知幾：《史通·叙事》，浦起龙释：《史通通释》第173，第173—174页。

②纪昀：《史通削繁》卷二，上海：扫叶山房书局，1926年版，第13页。

③刘勰：《文心雕龙·史传》，戚良德辑校：《文心雕龙》，第101页。

⑤黄叔琳：《〈史通训故补〉序》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史部第279册，第480—481页。

烦,而约略依稀,无甚高论,特敷衍以足数耳。学者欲析源流,有刘子玄之书在。”[①]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四库总目提要指出,《史通》“贯穿今古,洞悉利病,实非后人之所及”[②]。梁启超亦谓:“自有左丘、司马迁、班固、荀悦、杜佑、司马光、袁枢诸人,然后中国始有史。自有刘知幾、郑樵、章学诚,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。”[③]就刘知幾《史通》的独特价值而言,这些评价都是正确的;而就《文心雕龙》一书对它的影响而言,则是并不矛盾的。《文心雕龙》的文章观念笼罩《史通》,却并未将其淹没,而是最终成就了文史双美的佳话,这正是中国文论的独特魅力之所在。

[责任编辑:金　城]

①黄叔琳注、纪昀评:《文心雕龙辑注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57年版,第155页。

②永瑢等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八八,北京:中华书局,1965年版,第751页。

③梁启超: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8年版,第25页。